

學習蘇聯：中共宣傳與民間回應*

余敏玲**

摘要

抗戰結束之後，中共基於內外形勢的考慮，逐漸形成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然而，在中共奪取政權前後，中國除了少數親蘇人士之外，許多知識分子因為種種歷史情結或教育背景的關係而有反蘇情緒。至於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則對蘇聯毫無認識與瞭解。如何改變這種情勢，成為中共執政之後的重要工作。1949 年秋天成立的全國性中蘇友好協會就是中共在全國開展「宣傳蘇聯、學習蘇聯」的關鍵組織，透過琳琅滿目的宣傳活動，改變人民對蘇聯無知或不滿的情緒，從而樹立對蘇友好、以俄為師的觀念，將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到中共所制訂的親蘇政策，並且在這樣的過程中，型塑出社會主義新人。

中共的宣傳帶有明顯的強制灌輸單一思想的特色。當中共需要全面倒向蘇聯之時，農民大眾對蘇聯一無所知，許多知識分子則又有很大的反蘇情緒；而當民間逐漸對蘇產生好感之後，中共領導人卻開始考慮與蘇抗衡。因此，中共的宣傳既不能須臾放鬆，也往往與民眾情緒相對立，這便造成了官方宣傳與民間情緒錯位的現象。

* 本文撰寫與修改期間，承蒙沈志華、翟志成、沈松橋、楊久誼、陳永發、羅久蓉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3 年 1 月 29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3 年 4 月 4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雖然中共宣傳親蘇或反蘇會產生錯位現象，卻也說明中共的宣傳具有相當成效。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在這成效的背後，佔全國人口少數的知識分子，他們所發出異於官方觀點的「雜音」。從他們對宣傳蘇聯回應的多樣性，可以清楚地說明即使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人民也不是像極權主義理論者所言，只能被動承受當權者的意識形態灌輸，淪為國家政策下的棋子，完全被原子化(atomized)，毫無自己的看法。由本文之舉證在在顯示極權理論者詮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侷限。

關鍵詞：學習蘇聯、中蘇友好協會、中共宣傳、中蘇關係

抗戰結束之後，中共基於內外形勢的考慮，逐漸形成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然而，在中共奪取政權前後，除了少數親蘇人士之外，許多知識分子因為種種歷史情結或教育背景的關係而有反蘇情緒。至於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則對蘇聯毫無認識與瞭解。如何改變這種情勢，成為中共執政之後的重要工作。在一黨專政的情況下，依靠強大的政治力量來整合社會，引導廣大民衆按照官方的意志行動，是中共思想統治的核心。中共在與國民黨的長期鬥爭中，累積了豐富的宣傳、動員和組織群衆的經驗，並將這一經驗充分地運用在治國治民上。1949年秋天成立的全國性中蘇友好協會，就是中共在全國推動「宣傳蘇聯、學習蘇聯」的一個關鍵組織。中共試圖透過中蘇友協的活動與動員，破除多數民衆對蘇一無所知與少數民衆的反蘇情緒，從而樹立對蘇友好、以俄爲師的觀念，將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到中共所制訂的親蘇政策，並且在這樣的過程中，型塑出社會主義新人。

囿於篇幅，本文不談思想塑造過程中所採取的種種強迫與懲罰性政治手段，只將焦點放在宣傳手段上。一般而言，中共的宣傳模式是：只要中央一下令，所有黨、政、軍部門均須啓動各自的宣傳機器。因此當中共確定向蘇聯一邊倒政策之後，各機關組織即行全面配合，而中蘇友好協會是其中唯一專門負責宣傳蘇聯的組織。本文宗旨在闡析中共如何利用宣傳，通過中蘇友好協會，大張旗鼓地將對蘇一邊倒的政策轉變成群衆意志；而人民經歷鋪天蓋地的官方密集宣傳，對蘇觀感是否符合中共的期望，是否仍有背離官方宣傳的看法？

當今對於早期冷戰宣傳的研究正方興未艾。最新者有 *Cold-War Propaganda in the 1950s* 與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9-1965*。¹前者著重於歐美，後者聚焦於亞洲。但兩者均是以處理上層決策與宣傳內容、組織爲主，對於宣傳成效頂多是一兩句話交代過去。而目下關於中共宣傳的

¹ Gary D. Rawnsley ed., *Cold-War Propaganda in the 1950s* (NY: St. Martin's Press, 1999); Richard J. Aldrich, Gary D. Rawnsley & Ming-Yeh T. Rawnsley ed.,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9-1965* (London: Frank Cass, 2000).

著作，也側重對宣傳政策、媒介、組織與黨所扮演角色等通論性的研究。²唯一專門研究中共宣傳蘇聯的是張伯庚的博士論文。1991年，他以問卷方式訪問了250位北京居民（三分之二是在1950年代從事宣傳工作者），其中雖涉及受訪者對宣傳的效果評估，但論文重點仍在於宣傳本質及其功能。³有關人民如何看待官方宣傳蘇聯，至今尚未出現專題性的研究。筆者曾經寫過一篇論文，討論中共如何利用宣傳蘇聯文學人物來學習蘇聯以鑄造新人。⁴本文則是透過「群眾團體」——中蘇友好協會的活動，來審視學習蘇聯的宣傳與回應。其次，目前關於中共社會史的研究依然十分欠缺，筆者所見有關中共黨國與社會關係的探討，多半沿用主宰冷戰時期的極權理論派觀點，來解釋國家與人民的關係。⁵亦即將中共治理下的人民視為完全被動消極的個體，共產黨的命令與政策一下，人民只有遵從的份，完全沒有自己的看法。早在十多年前，蘇聯史研究已經對這樣的詮釋作了相當多的討論與修正。⁶唯獨對中國大陸社會的研究迄今未見任何討論與反思。細讀1950年代人民對中共宣傳蘇聯反應的多樣性，極權理論觀點對中共社會的適用性，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就史料運用而言，本文除利用中國大陸官方出版的報刊雜誌與文獻資料外，也參閱了其地方檔案。隨著大陸改革開放的深化，各省市的地方檔案館陸續對外開放，其所庋藏的資料對於1950年代的中共研究，助益匪淺。再

² Franklin W. Houn, *To Change a Nation: Propaganda and Indoctrin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NY: The Free Press, 1961); Frederick T. C. Yu, *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 (NY: Praeger, 1964).

³ Julian Po-Keng Chang, "Propaganda and Perceptions: The Sell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65" (Ph.D. Dis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1995).

⁴ 余敏玲，〈蘇聯英雄保爾·科察金到中國〉，《新史學》，卷12期4（2001年12月），頁25-74。

⁵ Franklin W. Houn, *To Change a Nation*; Xing Lu, "An Ideology/Cultur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Slogans in Communist China," *Discourse and Society*, 10: 4 (Oct. 1999); Xinlu Yu, "The Role of Chinese Medi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5-1969" (Ph.D. Diss., Ohio University, 2000).

⁶ 詳見 "Discussion," *Russian Review*, 45: 4 (Oct. 1986), pp. 357-413.

者，新華通訊社早年編輯的刊物《內部參考》，是本文探討民間看法的重要材料。這份出版品之特殊處在於，它是 1950 年代新華社向中共中央和國家高級領導幹部提供了解國內外現況的重要渠道。該刊著重於報導當時不宜向外公開的訊息，也有官方政策公諸於世之後所探訪到的民間反應。雖然它時有傾向於負面的報導，但是可以平衡官方報導的一面之詞，避免偏頗之病。

一、中共宣傳蘇聯的背景

從抗戰後期到國共內戰中期，毛澤東尚致力於爭取美國的同情，以期能與國民黨爭奪政權。然而，1948 年發生了柏林危機，美蘇對立越來越尖銳，中共認為，若要打倒蔣介石，除了暗中應盡力爭取蘇聯的援助之外，亦須繼續討好美國，但是必須選擇一個公開的外交立場。⁷儘管當時有許多社會名流，特別是有影響力的所謂民主人士如張東蓀、章士釗等，主張未來的中國應走既不親美也不靠蘇的第三條道路，⁸但是中共在 1949 年 3 月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時，已經確定向蘇聯一邊倒方針的基本輪廓。當時毛澤東指出，無須急於爭取帝國主義對中共政權的承認，拖到建國以後再求解決也不遲。⁹另一方面，毛澤東也明示：「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此點。現在對非黨人士也要說明這一點，也要做這種宣傳。」¹⁰

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等於正式對

⁷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1948 年 9 月）〉，《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卷 5，頁 131-133。關於戰後中美關係的變化，參見牛軍，《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賈中筠，《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⁸ 吳淑鳳，〈走不出的第三條道路〉，《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頁 198-199。

⁹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 年 3 月 5 日）〉，《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年），卷 4，頁 1435-36。

¹⁰ 毛澤東，〈中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1949 年 3 月 13 日）〉，《毛澤東文集》，卷 5，頁 262。

外宣布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此後又陸續發表文章加以闡述。他認為基於過去的革命經驗，中國必須在代表帝國主義的美國與代表社會主義的蘇聯之間，作一選擇，沒有第三條路可走。中國人民必須團結一致，抱持與美國長期鬥爭的決心，才能徹底瓦解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因此，中國在國際上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的一方。蘇聯共產黨是中國最好的老師，中共應向聯共學習。¹¹

有學者認為毛澤東的「一邊倒」政策是指新中國將「倒向社會主義」，而不該狹義地理解成「倒向蘇聯」。¹²這個說法看似有理，卻無實質意義。因為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惟蘇聯馬首是瞻，而且蘇聯是建設社會主義最早、最久、最有成就的國家，在時人眼中，社會主義就是蘇聯。不過，這個說法提醒我們，所謂一邊倒政策並非單純的外交方針，另外還有意識形態與內政建設的考量，特別是經濟發展的考慮。中共尚未取得政權之前，只有治理中國部分農村的經驗；掌權之後，如何經營城市，管理中國這個龐大的國家，如何重建中國因抗戰、內戰而衰敗不堪的經濟，都是中共領導人所面臨的嚴重考驗。再者，美國持續援助國民黨，中共基於意識形態的考量，也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一直有相當的疑慮與敵意，而蘇聯是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進行國家建設，成為世界強國之一。所以，依靠蘇聯、以俄為師，獲取蘇聯的全面援助，可以說是當時中共的最佳出路。因此，早在中共正式對外宣佈一邊倒政策之前，就開始尋求蘇聯的援助。例如，請求蘇聯專家到東北協助修復鐵路運輸與經濟建設，並要求蘇聯給予中國新政權低息貸款等。¹³

但是，中共確立和公布向蘇聯一邊倒政策之後，並不表示民間可以立刻

¹¹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別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竹內實編，《毛澤東集》（東京：蒼蒼社，1983年，版2），冊10，頁296-306、317-332。

¹² 章百家，〈從「一邊倒」到「全方位」——對50年來中國外交格局演進的思考〉，《中共黨史研究》，期1（2000年），頁22-23。

¹³ 關於蘇聯專家在東北的情況，詳見沈志華，《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2000年）；關於蘇聯對中國貸款，見沈志華，〈關於20世紀50年代蘇聯援華貸款的歷史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期3（2002年），頁83-93。

產生相應的親蘇情緒。事實上，在抗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除了少數左派知識分子之外，絕大多數中國下層老百姓對於蘇聯毫無認識。而許多知識分子與居住在東北的百姓，則對蘇聯印象不佳。究其原因，除了過去沙皇政府強佔國土、恃強凌弱的歷史積怨之外，戰後史達林的對華政策與蘇軍在東北的作為，也難辭其咎。

按照 1945 年 8 月國民政府與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軍隊應該在日軍離開後三個月之內撤出東北。然而蘇方基於美蘇冷戰的考量（蘇聯不願美國勢力進入東北，國民政府則剛好相反），加上東北經濟合作的談判與國民政府相持不下，以致蘇軍非但遲不撤離，反而利用佔領期間，將東北企業中大部分能拆卸運走的機器設備和器材物資等等，以「戰利品」為名，搬回蘇聯。甚至連日本官員留下的高級家俱，也被運回蘇聯。等到中國接收鞍山鋼鐵廠、瀋陽兵工廠和小豐滿發電廠時，蘇方只是「無償地」移交一些空房。¹⁴此外，代表國民黨的留美工程師張莘夫於接收蘇軍管轄區內的撫順煤礦之際，遭逢不測，蘇方一直沒有給中國一個滿意的解釋。¹⁵再加上雅爾達秘密協定在 1946 年 2 月後公諸於世，美蘇兩國背著中國政府，以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做交易的行徑暴露無遺，終於引發一連串大規模反蘇示威，從重慶較場口蔓延至全國各大城市。不過，當時國民政府與蘇聯正在談判有關接收東北的問題，蔣介石不願雙方關係進一步鬧僵，自然將反蘇示威活動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¹⁶所以蘇軍撤出東北之後，公開的反蘇浪潮亦隨之消退。

¹⁴ Donald Gillin & Ramon Myers ed.,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 頁 241-242。

¹⁵ 「據悉, 國民黨接收東北撫順煤礦專員張莘夫之被害, 係因共軍主管張學詩(思)曾對蘇軍言及張莘夫為美國留學生, 此次來東北……為美國佈置情報網之任務。又悉, 兇手乃公安隊長孫鳴(銘)久部下與蘇軍十名所為。」外交部檔案庫, 亞西司, 197.1/002, 東北及內蒙現狀研究案, 頁 12。張莘夫命案引發的反應, 詳見薛銜天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 1945-1949》(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6年), 頁 168-195。

¹⁶ 廖風德,《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 民國 83年), 頁 147-177; 共青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中國青年運動史》(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84年), 冊 1, 頁 233。

不過，蘇軍在東北的表現已經加深許多中國民眾對蘇聯的惡感。過去日本軍方一再宣傳赤色帝國的恐怖，而蘇聯軍隊接收東北之初的軍紀廢弛，正好印證其宣傳內容之可信。當時幾乎每天都發生士兵強奪民財、姦污婦女的事件。臺北外交部檔案中存有一份蘇軍暴行調查表，顯示蘇軍強入民宅，以刀槍脅劫民家財物者有之（從金飾、大衣等貴重物品到白麵、鋼筆等日常用品皆有），當街強行掠奪者有之，登堂入室姦殺婦女者有之。¹⁷難怪許多東北老百姓不滿地說：「走了小鼻子（日本人），來了大鼻子（蘇聯人）。」¹⁸隨後蘇聯軍事當局為整頓軍紀，採取極其嚴厲的措施，重懲不法軍人，甚至從國內調部隊換防。並且，為了改善與當地居民關係，蘇軍還幫助當地農民耕地。到 1946 年下半，蘇軍紀律明顯好轉。¹⁹儘管如此，蘇聯人先前留給當地居民的惡劣印象，還是難以抹滅。左派作家蕭軍於 1946 年秋天到哈爾濱各級學校、機關團體巡迴演講時，仍可感受到一般民眾憤懣難平的反蘇情緒。²⁰

不僅一般老百姓如此，甚至連在東北的中共普通黨員，對於蘇軍的種種作法也是深感不滿。他們無法理解，同是共產黨員，蘇軍為何處處監督、阻撓、限制中共的行動。例如，派人出席中共黨委的會議；不准公開舉行鬥爭地主的群眾大會；嚴格管制中共出版品，一旦發現有公開反蔣、反美的言論，立即全部銷毀。當時許多中共黨員認為這是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表現，有些人甚至認為中共中央所決定的「以蘇為主」政策，實際上是「以我（中共）為奴」。殊不知當時蘇聯擔心中共行動超出中蘇同盟條約允許的範圍，會引起南京政府與美國的抗議，造成蘇聯外交上的困擾。事實上，蘇聯暗地支持中共在旅大建立黨政警機構、從事軍工生產、裝備大批「武警」開赴前線等。²¹

¹⁷ 〈蘇軍暴行調查表〉，外交部，亞西司，125.5/0001，頁 1-10。

¹⁸ 傅萬杰整理，〈蘇聯駐金縣的情況〉，王佩平、孫寶運主編，《蘇聯紅軍在旅大》（大連：大連市史志辦公室，1995 年），頁 209。

¹⁹ 夏振鐸整理，〈蘇聯紅軍進駐旅大的十年〉；韓光，〈旅大八年（摘錄）〉，《蘇聯紅軍在旅大》，頁 17、69。

²⁰ 張毓茂，〈跋涉者——蕭軍〉（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313-314。

²¹ 夏振鐸整理，〈蘇聯紅軍進駐旅大的十年〉；韓光，〈旅大八年（摘錄）〉；劉順元，

只是當時多數普通黨員不可能知道這些情形。即使到中共當局掌控東北之後，也不能公開報導蘇聯對中共的支持，只能用箝制言論的方式，打壓反蘇情緒。最著名的例子是 1948 年蕭軍在哈爾濱主編《文化報》時，撰文批評莫斯科與俄國人在東北的惡劣行徑，引發中共動員「輿論」，全面批判圍剿蕭軍。²²

中共除了必須面對民衆對蘇聯的無知或反蘇情緒之外，同時還必須讓廣大人民瞭解新中國將何去何從，未來要走什麼道路？所以，向群眾宣揚蘇聯過去的建設成果及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使老百姓都明白中國為什麼要學習蘇聯，也是當務之急。當時即使有人知道中國將來要步入社會主義社會，但是多半不清楚那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如何走向這樣一個社會？不要說是一般民衆，就是中下層共產黨幹部，也沒有幾個人知道共產主義的底蘊。許多老百姓不斷的追問：「到底這個和我們最有緊密關係的國家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呢？為什麼它能這麼慷慨無私的援助我們呢？為什麼它在一切方面都站在全世界最先進的地位上呢？蘇聯的工人是怎樣生活的呢？蘇聯的農民是怎樣生活的呢？」中共就必須「通過許多具體的材料向大家介紹有關蘇聯的各個方面」。²³其實，宣傳蘇聯也等於是宣傳中共所要走的社會主義道路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中共的自我宣傳。

中蘇友好協會正是基於這些考慮而成立。中共向來視宣傳工作為政治運動，其目的是在塑造人民的思想，統一人民的世界觀，以加強人民對其政權的認同，鞏固其統治。

二、宣傳學習蘇聯的活動

1945 年秋天，中共已在蘇軍管轄之下的東北各大城市，如哈爾濱、長

〈中共大連黨組織與駐連蘇軍關係〉，《蘇聯紅軍在旅大》，頁 30-31、66-68、76-78。

²² Frederick T. C. Yu, *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 pp. 62-63.

²³ 張仲實，〈認真加強關於蘇聯的宣傳工作〉，《學習》，卷 4 期 12（1951 年 10 月 1 日），頁 23。

春、瀋陽等地，陸續成立中蘇友好協會的組織，宣傳蘇聯，介紹蘇聯科學文藝，促進中蘇友好，主張和平，反對內戰。²⁴隨著中共政權的逐步建立與擴展，到 1949 年初，東北其他地區和內蒙各地也相繼出現同名機構。不過，當時內戰尚未結束，中蘇友協的工作開展有限。²⁵直到中共中央進駐北平不久後，方於 7 月 16 日舉行全國性中蘇友好協會發起人大會。在 689 位發起人之中，以中共第二、第三號領袖劉少奇、周恩來與宋慶齡領銜，其餘若非中共高級領導人，即是赫赫有名的所謂民主人士（如沈鈞儒、李濟深、邵力子等），還有一群文藝界、學界、工商界領袖。²⁶這是中共向蘇聯強烈表態，宣示其堅決實施一邊倒政策的決心。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僅僅四天之後，甚至在中央政府各部門尚未完全齊備之時，中蘇友好協會總會便在北京正式成立。由甫就任國家副主席的劉少奇擔任總會長，並親自在成立大會上致詞。從中蘇友好協會發起人名單及其組建過程，可以明顯看出，中共高層對這項宣傳工作的重視。正因為如此，友協雖貌似民間組織，實則受中共中央控制，並設有黨組，掌控一切內外事務。

中共將友協定位為統一戰線的組織，首要任務是大力發展會員，建立分支單位。其吸收會員的基本原則，十分寬鬆。凡是願意致力於增進中蘇友好、學習蘇聯者，不分階級、黨派、宗教信仰、性別，都可以成為會員；並且特別強調對工農群眾或知識分子，實行開門主義。友協吸收會員的方式主要是仿照黨的結構和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由各級組織出面號召和動員；並透過解放軍、全國總工會、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後改為共青團）、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後改為學聯）、全國民主婦聯、全國文聯等團體來進行。由於

²⁴ 中共黨史上最早出現的親蘇組織，是 1932 年 11 月在中央蘇區成立的擁護蘇聯總同盟。該組織於 1933 年初與反帝總同盟合併，統稱為中央蘇區反帝擁蘇總同盟。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659；〈И.Шикин 致 Маленков 報告〉，1945 年 11 月 3 日，РГАСП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無檔號，頁 5-6；牛乃文、王式斌，〈憶哈爾濱市中蘇友好協會〉，《哈爾濱文史資料》，輯 10（1986 年 12 月），頁 95。

²⁵ 〈郭沫若開幕詞〉，《人民日報》，1949 年 7 月 17 日，版 1；1950 年 1 月 21 日，版 1。

²⁶ 〈中蘇友好協會籌委會名單〉，《人民日報》，1949 年 7 月 17 日，版 1。

有這樣的動員機制，友協會員數量的成長極為快速。根據《人民日報》發表的統計數字，至 1950 年 1 月底，全國友協會員已超過 200 萬。到 1951 年，人數激增到 1,700 餘萬人，到 1952 年 11 月初，會員更號稱有 3,890 萬；使得友協人數超過青年團、工會、婦聯而成爲全中國最大的「群眾團體」。²⁷ 在短短三年之內，友協能有如此成績，即使是表面上的數字，亦不得不令人佩服中共動員組織的能力。

「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熱愛蘇聯，學習蘇聯」、「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中蘇友好無敵於天下」、「走蘇聯的路幸福，和蘇聯交好朋友，咱們的幸福就紮了根」，這些都是 1950 年代在中國大陸十分流行的宣傳口號。綜而言之，友協宣傳的內容一般包括介紹蘇聯的國家和社會制度、先進生產經驗、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科學藝術的成就、蘇聯人民高尚的共產主義道德以及中蘇兄弟般的友誼諸端。不過，隨著不同時期的特殊需要，友協的宣傳重點也有差別。在中共建國初期(1949-1952)，其所強調的大抵偏重於蘇聯的國家制度、政經軍事文化、人民生活狀況、十月革命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時期(1953-1957)，以宣傳蘇聯先進經濟建設爲主；其後則以蘇聯的科學成就爲要點。

中共宣傳方式之多樣與多變，可謂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從民間熟悉的傳統方式，例如大鼓、洋片、雜耍、秧歌、腰鼓隊等，到現代的放映幻燈片、電影都有。各地友協舉辦的經常性活動包括展覽、演講、座談會、聯歡會、讀書會、流動圖書館、壁報、黑板報、街頭宣傳站、流動宣傳車、話劇演出、教唱俄國歌舞等。²⁸ 東北地方還開展了「回憶運動」，通過回憶對比的方式，肅清過去日本灌輸反蘇教育思想的「毒害」。更有即興宣傳，如在安瀋線火車上講演，並組織乘客座談。²⁹

²⁷ 《人民日報》，1950 年 3 月 27 日，版 3；1950 年 10 月 5 日，版 1；錢俊瑞，〈兩年來中蘇友好協會作了些什麼〉，1951 年 10 月 5 日，版 1；〈中蘇友協三年來成就巨大〉，1952 年 11 月 5 日，版 1。

²⁸ 《人民日報》，1950 年 3 月 27 日，版 3。

²⁹ 劉影整理，〈中蘇兩國人民團結友好的橋樑〉，《蘇聯紅軍在旅大》，頁 247-251；〈大連市友誼月工作總結〉，《友誼》，卷 5 期 7（1949 年），頁 44-46；《人民日報》，

除了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宣傳教育，中共還經常組織專門的學習。透過宣講文件、時事討論、閱讀資料與座談討論等方式，加深意識形態教育，同時亦藉此尋找積極分子。北京大學組織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舉辦「關於中蘇友好協會座談會」，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座談會的通告中不但列出參考文件目錄，連討論大綱也一併事先公布。³⁰

爲了更好地宣傳蘇聯及全面地學習蘇聯，中共更極力在全國推廣俄語教學。早在建國之前中蘇友協即已設立俄語班，到建國之後，更在全國各地推廣俄文學校與教學班。不僅許多廣播電臺開播教授俄語的節目，同時教育部也在各大專院校增設俄語系，連中學的外語課程也改以俄語爲主（中共建國前的中學基本上沒有俄語課程）。到 1952 年底，俄語已經成爲全國第一外語。³¹此外，出版刊物也是中共經常運用的一種宣傳方式。各主要大城市的友協均有自己的出版品。在總會成立後的一年之中即出版期刊 38 種，宣傳小冊 21 種，報紙 5 種，一般報紙副刊 12 種。東北總分會還出版了適合工農讀者的《會員教材》、《會員課本》。1952 年 10 月 5 日，中蘇友協總會開始出版機關報《中蘇友好報》，這是全國唯一以介紹蘇聯爲主的通俗性報紙。³²不過，在所有出版品中，流通量與影響力最大的當屬中文版的《蘇聯畫報》。該刊在莫斯科印刷出版，運到中國，主要以圖畫介紹蘇聯，不論識字與否都能閱讀，宣傳效果極佳。各地友協與其他機關單位大多訂有《蘇聯畫報》，這是當時許多人認識與了解蘇聯的主要來源。

文字宣傳固然重要，但是以一個文盲佔絕大多數的中國而言，聲音與圖像宣傳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文字。所以，各主要大城市友協均製作與蘇聯有關

1950 年 4 月 17 日，版 3；1950 年 4 月 19 日，版 4。

30 〈通告（一）38 年 9 月 4 日〉，《北大週刊》，期 8（1949 年 9 月 12 日）。

31 《人民日報》，1952 年 11 月 5 日，版 1。

32 〈中蘇友好協會一年工作報告（1949 年 10 月-1950 年 9 月）〉，《人民日報》，1950 年 10 月 7 日，版 1；子平，〈群眾歡迎《中蘇友好報》〉，1952 年 12 月 18 日，版 3。其中以總會的《中蘇友好》、東北的《蘇聯介紹》、旅大的《友誼》、武漢的《益友》、上海的《蘇聯知識》等發行份數較多，範圍較廣。《中蘇友好報》每月逢五出刊，四開版的小報，該報的特點是文章短小、通俗、插圖較多。1957 年《中蘇友好報》改爲雜誌月刊。

的廣播節目，並組織人民收聽廣播。³³相對於靜態的圖片展覽、報章雜誌，動態的電影、幻燈片等宣傳媒介有趣得多，又含有現代、文明、進步的意味，深受農民歡迎。中共自然不敢輕忽影片放映隊的工作與擴充，在其建國不到兩年的時間，全國友協即已擁有 140 個放映隊，幻燈機 440 臺(不完全統計)。到第三年全國共有 200 多個電影放映隊，2,500 多個幻燈隊。他們利用農民趕集的習慣，經常深入偏僻的鄉村，甚至山區和草原放映蘇聯影片。許多農民常常一聽到放映隊要來的消息，三、四天以前就從家裡出發，不辭辛苦、不煩路遠地趕著大車到放映地點等候。³⁴當時放映的蘇聯電影主要以宣揚革命精神、共產主義道德、「反法西斯」戰爭、「反特」、「反諜」、反帝為主。紀錄短片的內容則以政治新聞、經濟、科技、體育、蘇聯建設為主。觀眾看完影片之後，幹部一般都會組織座談討論，糾正思想，以期充分發揮應有的教育功能。

中蘇友協與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互派訪問團、組織中蘇人民通信，也是一種宣傳與文化交流的方式。訪問團的成員一般除了學界、文藝界、體壇人士之外，還包括各種勞動或生產英雄。中共當局希望透過這些著名公眾人物所見所言，提高宣傳的說服力。此外，最為當局重視的則是配合國內外局勢、黨國政策方針而推出的宣傳活動，將友協的工作與當前政治路線作緊密的結合。從中共建國起到中蘇分裂，每年必然有兩個大肆慶祝與宣傳的節日：一是十月革命紀念日，一是 1950 年 2 月簽訂中蘇互助友好同盟條約紀念日。

1953 年春天史達林逝世，蘇聯積極調整對華政策。例如擴大援建項目、提高貸款額度、增派專家來華、提前歸還旅順基地、轉讓四個中蘇合營公司的蘇聯股份等。

另一方面，從 1952 下半年以來，韓戰已進入尾聲，中共即將全面開展經濟建設，周恩來也到莫斯科洽談第一個五年計畫的援助事宜。韓戰期間中

³³ 《人民日報》，1952 年 8 月 5 日，版 3。

³⁴ 錢俊瑞，〈兩年來中蘇友好協會作了些什麼〉，《人民日報》，1951 年 10 月 5 日，版 1；〈中蘇友協三年來成就巨大〉，1952 年 11 月 5 日，版 1。有些地方友協不但能自製幻燈片，甚至還能自製幻燈機。

共需要蘇聯援助武器裝備，此後經濟建設則需要蘇聯的技術、資金、設備、專家、資料等援助。宣傳學習蘇聯與中蘇友好，因而更具有迫切性。1953年2月7日，毛澤東在全國人民政協第一屆第四次會議閉幕典禮中便說：「我們要進行偉大的國家建設，我們面前的工作是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不夠的，因此，要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要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³⁵毛這番講話，更促使中共各級領導特別注意各單位執行學習蘇聯的情況。同年秋天，中共中央特別下達一份文件，專門強調「正確地學習與運用蘇聯先進經驗」，乃是成功地完成中國各項建設的一個重要因素。³⁶由此更進一步推動向蘇聯學習的高潮。

爲了配合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實施，友協的宣傳重點隨之轉向蘇聯進行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和增產節約的經驗、蘇聯人民在經濟建設中艱苦奮鬥的歷史、蘇聯對中國經濟建設無私的全面性援助、蘇聯專家在華貢獻、蘇聯先進科技成就等等。其次，從1953年開始，爲慶祝十月革命，由文化部主辦，友協與中國電影發行公司等單位協辦的「蘇聯電影週」，固定於每年11月在全國二、三十個大城市放映蘇聯電影，不舉辦電影週的城市也盡量配合播放蘇聯影片。據統計，到1955年底，在中國放映過的蘇聯影片約有兩百萬場，觀眾達十一億六千萬人次。不但在城市，連基本建設工地、農村、康藏高原與許多小海島，都能看到蘇聯影片。³⁷換言之，蘇聯電影已經取代了美國電影（自1950年10月起在大陸停映），成爲在中國播映最爲頻繁的外國電影。此外，中蘇友好協會也擴增宣傳陣地的硬體設施，分別在北京、上海、天津、瀋陽、包頭等二十多個大中城市，先後成立友好館或文化館，作爲當地介紹蘇聯和進行中蘇友好活動的中心。³⁸

³⁵ 毛澤東，〈在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的講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4，頁45-46。

³⁶ 中國社科院、中央檔案館編，《1953-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綜合卷）》（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2000年），頁878-880。

³⁷ 在這之前，友協與文化部也常播放電影，但不是以電影週形式出現。〈我國人民熱愛蘇聯電影〉，《人民日報》，1955年11月7日，版2；〈蘇聯電影週開幕式在北京舉行〉，1956年11月6日，版2。

³⁸ 錢俊瑞，〈中蘇友好協會四年來的工作報告〉，上海市檔案館，C38-2-80，頁2-5；內

第一個五年計畫強調經濟建設，所以友協組織的訪蘇團的回國報告均以介紹這方面的蘇聯建設為重點。這些訪蘇代表對於蘇聯勞動英雄的生活與居住環境，印象深刻（殊不知，這些人的生活條件在蘇聯屬於特權階級）；極力讚揚勞動英雄忘我的工作態度和樸素踏實的作風，與不斷加強政治和技術學習的精神。他們認為蘇聯勞動人民生活的提高，不只表現在對單純物質富裕的追求上，更是建築在保持勤勞樸素的高尚品質和高度文化素養的基礎上。同時，蘇聯人民為了配合政府的墾荒計畫，皆各盡所能地熱烈參與：畫家為墾荒運動畫海報、詩人起草標語口號、演員隨劇團到墾荒地地區演出等等。³⁹

這些訪問團員所發表的訪蘇觀感，在公開的出版刊物上自然是一邊倒的稱好，有些描述甚至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例如，女作家陳學昭參加中國婦女代表訪問團，出席蘇聯十月革命的慶祝典禮。她參觀蘇聯養雞場，得到的印象是：產蛋室很乾淨，裡面鋪有軟草作墊子。「產蛋室如果正好擠滿了，那麼要生蛋的雞就會在產房門口等待著，他們絕不隨地亂生蛋。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裡，雞也被訓練得這樣聰明守秩序。」⁴⁰這種匪夷所思的陳述不禁令人聯想到喬治·歐威爾的小說《動物農莊》。

在一五計畫期間，各地友協也紛紛出版許多頌揚蘇聯專家在華成就的小冊以宣傳學習蘇聯。⁴¹根據統計，在 1954-1957 年期間，蘇聯前後共派來專家約 5,000 名協助中國建設，主要集中在軍事與工業方面，共 156 個項目，

蒙古自治區檔案館，全宗 309，目錄 2，卷宗 140，頁 98-103。

39 〈繁榮幸福的和平民主國家，烏拉爾重型機器製造場訪問記〉，《人民日報》，1953 年 9 月 7 日，版 4；〈中蘇友協訪蘇代表團團長錢俊瑞等談訪蘇觀感〉，1954 年 6 月 12 日，版 3；〈向偉大的蘇聯人民學習〉，1955 年 7 月 13 日，版 3；千家駒，〈學習蘇聯人民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精神〉，1957 年 10 月 16 日，版 3。

40 陳學昭，〈赫魯曉夫集體農莊〉，《新中國婦女》，期 1（1954 年），頁 24。

41 例如，江蘇省中蘇友好協會編，《蘇聯專家在江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53 年）；河南省中蘇友好協會編，《蘇聯專家在河南》（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 年）；湖南省中蘇友好協會編，《蘇聯專家在湖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 年）。

為中國的工業化奠下初步基礎。⁴²蘇聯專家在大連造船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艦艇製造業、治理與利用黃河方面均是功不可沒。1952年啓用的北京蘇聯紅十字醫院，在1957年3月12日將全部設備無償移交中國；武漢長江大橋因為是蘇聯專家協助修建的，許多人稱其為「中蘇友誼橋」。⁴³這些專家在華的貢獻，成了宣傳中蘇友好的最佳實例。

不過，蘇聯專家來華工作，雖說建樹良多，卻也出現若干問題。一是造成許多幹部或技術人員太過依賴蘇聯專家。有些工廠主管在工作中遭遇困難，常常不花腦筋，不願深入鑽研，直接找蘇聯專家代為解決；甚至有人說這是「孩子哭抱給娘」。⁴⁴另一嚴重問題是，有些蘇聯專家的建議或作法不適合中國國情。例如，蘇聯專家在軍校上課，只講聯共黨史，不講中共黨史；只講蘇聯二次大戰的十大戰役，不講中共引以為傲的韓戰。更令中共難以接受的是蘇聯專家在馬列學院講課，內容居然沒有一處提及中國，完全不講馬列主義在中國的運用。此外，還有一個重大分歧，那就是有關中國軍隊是否應該實施一長制的問題。⁴⁵基於這一連串的衝突，因此當第一個五年計畫進

⁴² Л. В.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蘇中科技合作, 1949-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No. 65: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с. 24; Т. Г. Зазерская,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з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 (1949-1960 годы)* (蘇聯專家與中國軍工業的建立, 1949-1960) (Петербург: НИИХ, 2000).

⁴³ 北京蘇聯紅十字醫院移交中國後，改名為友誼醫院。《人民日報》，1955年6月19日，版4；1957年3月13日，版1；1957年11月3日，版8。關於在華蘇聯專家的研究，最好也最詳盡的是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年)。

⁴⁴ 旅大市中蘇友好協會宣傳部，〈中蘇造船公司向蘇聯學習的初步總結〉，大連市檔案館，全宗7，目錄2，卷宗60，頁15-16；〈各地知識份子工作中的問題〉，《內部參考》，號10(1956年1月21日)，頁135。

⁴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頁326-327；Д. Кейпл,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 1949-1960 гг” (揭開中蘇之間的神話, 1949-1960),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冷戰：新角度與新文獻) (Москва: ИВИ РАН, 1995), с. 338. 關於一長制問題，詳見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頁248-250。

行順利，經濟建設也累積一些經驗後，中共便著手試圖探索一條適合自身情況的道路，對於全面學習蘇聯開始採取比較保留的態度。⁴⁶

1956年2月底，赫魯雪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當晚，對史達林的錯誤與個人迷信問題展開批判。這個「秘密報告」震撼了全世界，對於中共本身與中國後來的政治發展也有重大深遠的影響，更埋下日後中蘇分裂的種子。毛澤東認為赫魯雪夫此舉是「揭了蓋子，捅了簍子」。「揭了蓋子」指的是，蘇聯、蘇共、史達林並非一切都正確，這就破除了對蘇聯的迷信。「捅了簍子」則是指赫氏的「秘密報告」無論在方式或內容上（沒有事先通知兄弟黨；而且不該全面否定史達林，應該三七開），都犯了嚴重錯誤。⁴⁷因此毛澤東在4月25日政治局召開的擴大會議上，開始陸續講述〈論十大關係〉，正式提出要以蘇為鑒。⁴⁸

到了1958年，中共所推動的大躍進使得全中國開始走向極左狂熱的「國家建設」。相較之下，蘇聯經驗便顯得落後保守。赫魯雪夫對於中國正在進行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制度疑慮重重，遲遲沒有答應中國所提出的新的援助要求。⁴⁹偏偏中共砲擊金門又沒有事先通知蘇聯；雙方關係益趨緊張。1959年蘇共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出現了批評中共人民公社、大躍進等路線政

⁴⁶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上卷，頁472、484。

⁴⁷ 最初，毛澤東比較強調的是揭了蓋子部分。亦即赫氏批史，揭露史達林大國沙文主義的一面；在某種程度上，也等於是宣洩了毛過去與史達林交涉所受的怨氣。同時也破除了長期以來中共內部對蘇聯的迷信與教條主義。但是到了1956年秋波蘭、匈牙利發生事件之後，毛認為蘇共二十大的全面否定史達林，將社會主義矛盾暴露於外，是造成波、匈「動亂」的主因。中國必須有所警惕，不要重蹈蘇聯覆轍，同時也令毛澤東聯想到自己身後是否也會發生類似史達林的遭遇？此後毛澤東則更重視捅了簍子的部分，因此對於蘇共二十大的批評也日趨負面。詳見吳冷西，〈憶毛主席〉（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頁4-5；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李慎之、何家棟，〈中國的道路〉（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年），頁357-358。

⁴⁸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冊6，頁82、101-105。

⁴⁹ Roy Medvedev, *Khrushchev, the Years in Power*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87.

策的言論。加上蘇聯在中印邊境衝突中，並未偏袒中共，甚至指斥中共不值得為邊界的不毛之地，妄動干戈，這又使得中共十分惱怒。1960年夏天中蘇雙方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發生激烈爭吵。⁵⁰同年7月赫魯雪夫突然決定召回所有在中國的蘇聯專家。1962年中蘇上層關係雖稍趨緩和，但到1963年7月莫斯科會議時中蘇兩黨關係又告破裂。7月14日，蘇共中央發表公開信，敘述中蘇矛盾的分歧由來。從9月開始至次年7月，中共也陸續發表9封公開信，批評蘇共，展開中蘇大論戰，這就是著名的「九評蘇共中央」，從而開啓了兩國兩黨持續三十年的冷戰。

從中共中央提出以蘇為鑒到中蘇分裂，兩國關係漸形疏遠，中蘇友好協會的組織、編制、經費亦隨之逐年縮減，宣傳學習蘇聯也不再像過去那樣的大張旗鼓，而是日趨減弱。到1966年4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將各地中蘇友協劃歸外交系統管轄，作為對外友好協會的一個從屬機構，⁵¹中蘇友協變成勉強維繫中蘇交往的一個下游外交渠道而已。其後隨著文化大革命中「反蘇聯修正主義」宣傳的開展，中蘇友協完全喪失原有組建目的而致銷聲匿跡。

當中蘇關係逐漸走入低潮之時，宣傳蘇聯的重點放在與政治比較無關的科學。這其實也與1957年以來蘇聯科學的驚人發展有關。1957年蘇聯成功地發射了世界上第一個超遠程洲際彈道火箭，隨後又陸續升空三顆人造衛星，開啓了人類太空探險之門。連自認科學領先全球的美國，亦不得不承認蘇聯科學已居世界主導地位，並緊急制訂各種政策，力圖急起直追。因此讚揚蘇聯的科學成就或將其籠統地含括在「學習蘇聯先進經驗」之範圍，成為官方宣傳的焦點。另一宣傳重點則是列寧。這是因為蘇共二十大之後，中共已經無法繼續宣傳史達林的豐功偉業，所以宣傳重點也特別強調十月革命的重要性、列寧生平及列寧主義的勝利。

其次，由於中蘇上層關係的急遽變化，加上國內極左冒進的情勢，使得友協的例常性宣傳在頻率與規模方面有降低趨勢，許多從事宣傳工作的幹部

⁵⁰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333。

⁵¹ 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22，卷45，頁16-17。

也都感覺難以拿捏分寸。在大躍進期間，許多友協地方幹部都對是否還能宣傳蘇聯感到十分困惑。他們認為中國搞人民公社，提倡小高爐煉鋼，凡此種種蘇聯都沒有類似經驗，又怎樣將宣傳與當前中心工作結合？怎樣宣傳學習蘇聯？有個地方友協的畫廊，依循舊例，仍然只展覽中蘇友好的圖片，而沒呈現中國在大躍進的「成就」，就被當地黨委宣傳部批評是「喧賓奪主」。⁵² 針對宣傳人員的困惑，中共中央指示宣傳活動「不可不搞，但又不可多搞」。⁵³ 面對中央這樣的指示，宣傳工作人員自然會由過去的積極主動，變成消極被動：凡事格外小心謹慎，地方性交流活動能免則免。中共中央還特別強調宣傳工作不能只侷限於宣傳蘇聯，還需重視宣傳中國，否則就是一條腿走路，沒有貫徹兩條腿走路的工作方針。所以舉辦展覽的中蘇圖片比例必須各半，圖片來源也從過去絕大多數由蘇聯寄送來華，變成由友協總會或地方友協自行編製，蘇聯贈送的只佔百分之十左右。並且，連中國贈送給蘇聯的畫冊、書籍、文字資料、照片都必須事先請示或經過黨委的嚴格審查。⁵⁴ 從 1960 年開始，友協最持久的宣傳活動——全國性的「蘇聯電影週」停止舉辦。那一年只在全國十三個大城市舉辦十月革命節電影週活動。⁵⁵ 1960 年 7 月以後，宣傳活動更侷限於中蘇友協與蘇中友協（1957 年 10 月底成立）接待互訪人員；配合重大節日（中蘇同盟條約週年、勞動節、國慶）舉辦應景式

⁵² 〈關於改進中蘇友好協會工作問題的報告〉，1957 年 2 月 6 日，黑龍江省檔案館，全宗 134，目錄 2，卷宗 26，頁 1-2；〈大躍進中能否宣傳蘇聯〉，1958 年 9 月 20 日，黑龍江省檔案館，全宗 134，目錄 2，卷宗 33，頁 41-42。

⁵³ 〈中央批轉中蘇友好協會總會關於中蘇友好協會今後工作任務的請示報告〉，1959 年 4 月 11 日，長春市檔案館，全宗 1，目錄 1-12，卷 49，頁 46-47。

⁵⁴ 〈內蒙古中蘇友協五年來工作總結〉，1959 年 4 月 7 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全宗 309，目錄 1，卷宗 125，頁 31-39；〈上海市中蘇友好協會宣傳工作主要情況（草稿）〉，1961 年 7 月 15 日，上海市檔案館，C38-2-110，頁 46、48；〈關於中蘇友誼館及電影場的活動情況報告〉，1963 年 8 月 17 日，上海市檔案館，C38-1-30，頁 53、58、60。

⁵⁵ 〈十月革命節電影週結束〉，《人民日報》，1960 年 11 月 15 日，版 4。1961 年 4 月起，上海市委宣傳部為配合外語學習的需要，批准上海友協放映蘇聯電影。直至 1965 年上海市仍以其他名義繼續舉辦蘇聯電影週。詳見上海市檔案館，1963 年 9 月 10 日，C38-1-30，頁 85；上海市電影局史志辦公室編，《上海電影史料》，輯 5（1994 年），頁 129-162。

的活動，互拍賀電、通訊、贈送紀念品等。⁵⁶例常性的活動如展覽、演講、座談、晚會、俄文詩歌朗誦、俄國音樂欣賞等，雖仍舉行，其頻率及規模已完全無法與建國初期相提並論。而且許多活動雖名為「群眾性活動」，其實只准許積極分子參加。⁵⁷不過，縱然如此，這些活動依然持續，只是逐年遞減，直至文革開始才完全消失。

三、民間對宣傳學習蘇聯的回應

評估任何議題的宣傳效果，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都是一件困難又複雜的事。在共產國家由於言論自由的受限，更是難上加難。更何況中國又是個地廣人眾的國家，出現各種不同的聲音，亦不致令人感到意外。由於資料的限制，筆者無從將民間的反應完全依階級、職業、性別、年齡、城鄉、地域、教育程度等差異深入細分。因此，本文所談的宣傳效果問題，只能就筆者目前所見材料，歸納出一些傾向或大致趨勢而已。

中共建國初期，透過友協的密集宣傳，特別是 1952 年 11 月友協所舉辦之大規模全國性「中蘇友好月」活動，至少使得大多數百姓知道中國要走蘇聯的道路，或對蘇聯這個國家逐漸感到興趣、有所認識。大致而言，宣傳蘇聯，若能與實際生活經驗配合，容易收效。例如，蘇聯防疫隊在熱河、察哈爾省協助迅速撲滅鼠疫，特別贏得民心，促使農民紛紛加入友協，以致熱河分會有一半的會員是農民。⁵⁸其次，對於大多數原本對蘇聯一無所知的農民而言，他們看到拖拉機照片會說：「咱們什麼時候也用拖拉機呢？過去只說一邊倒，了解不透徹，現在明白了，我們要走蘇聯人的路。」看到所放映的蘇聯集體農莊和科學技術紀錄片，他們對蘇聯集體農莊也產生興趣，認為實行土改，消滅地主階級後，就要向蘇聯學習，發展農業生產。⁵⁹各地農民一

⁵⁶ 1962 年 8 月 24 日，吉林省檔案館，全宗 77，目錄 8，卷宗 4，頁 73-82；1963 年 10 月 29 日，上海市檔案館，C38-1-30，頁 93。

⁵⁷ 1963 年 5 月 8 日，上海市檔案館，C38-1-30，頁 107。

⁵⁸ 《人民日報》，1950 年 1 月 21 日，版 1。

⁵⁹ 《人民日報》，1950 年 2 月 6 日，版 3；1950 年 1 月 20 日，版 4。

聽到赴蘇參觀農民代表團要作報告，也不在乎路途遙遠，紛紛聞風而至。在聽完報告後，發言踴躍，提問近百，要求解答。他們最關心的是集體農莊的實際狀況：「究竟都集體些什麼？」（有哪些財產被集體化）、「怎樣集體化？」、「土地怎樣歸公？」、「莊員的房子是否歸自己？」、「莊員自己的小塊私有土地從哪裡來？如何耕種？是不是有時間耕種？」等等。⁶⁰回答這些問題也等於是為中共即將推行的農業合作化作廣告。

推行工業化亦是中共建國後努力的目標之一，因此關於蘇聯頓巴茨煤礦——其規模與產量是蘇聯經濟建設的驕傲——的圖片，也在全國各地巡迴展覽。工人看到這些圖片之後，往往希望中國的煤礦能很快建設成像頓巴茨那樣。此外，蘇聯低息貸款給中國，民衆反應此舉能幫助中國建立許多工廠，減少失業。更有些工人認識到蘇聯對中國的友好援助，從而提醒自己要小心使用、好好保護蘇聯給中國的機械，因為這些也都是蘇聯人民用血汗換來的。⁶¹不過，也有些工人只知道中蘇友好，蘇聯好。問他們為什麼好，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⁶²

一般來說，知識分子與城市居民比較關心時事與國家主權問題。1950年官方報章雜誌雖然大肆宣傳剛剛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鞏固了中蘇友誼，保障了世界和平」，他們對於這些空泛的敘述，基本上沒有什麼反應，反而質疑為什麼中長路與旅順要到1952年才歸還中國？⁶³到了1952年秋天，中蘇會談公報宣布蘇聯歸還中長路，中蘇共管旅順。有些人在欣喜蘇聯歸還中長路之餘，亦自覺慚愧過去對蘇聯的懷疑。至於中蘇繼續共管旅順一事，則反應不一。有人認為這是蘇聯為中國「看大門」，因為中國的海軍還

⁶⁰ 〈山西農民提出若干關於集體農莊的具體問題要求解答〉，《內部參考》，號259（1952年11月21日），頁258-260。

⁶¹ 《人民日報》，1951年11月8日，版2；1950年2月16日，版3；1950年4月17日，版3。

⁶² 〈太原市民對於「中蘇友好」的各種認識〉，《內部參考》，號258（1952年11月20日），頁233。

⁶³ 〈中央宣傳部關於宣傳中蘇新約幾個問題的指示（1950年3月11日）〉，《中國共產黨宣傳文獻選編，1949-1956》（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年），頁22-23。

太弱。也有人說蘇聯共管旅順是「侵略」。更有人猜測有些商談沒有公布，可能還有隱情。⁶⁴旅順居民對於這項宣布則是十分強烈的負面反應。許多人因此將怒氣直接發洩在當地的蘇聯人身上，常常可見他們與蘇軍吵罵，在電車上故意對他們又推又擠，甚至出手打人。⁶⁵但是，據新華社內部刊物報導，比起兩年前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之初，群眾思想的混亂情況，「已有極大改變。」⁶⁶

1952 年的中蘇友好月結束之後，各地友協與相關部門紛紛檢討宣傳成效，同時也收集了不少不滿蘇聯的言論。由於當時比起 1950 年代後期，人民享有較大的言論空間，因此，對蘇不滿之論，似乎在城市之中處處可聞。造成這些不滿情緒，歸納起來有下列數個原因：

1. 因為宣傳內容欠明或執行政策不當所致。許多上海里弄居民看不懂電影、圖片，也聽不懂報告。例如，宣傳人員沒有解釋清楚「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這句話，致使許多居民疑惑地問道「蘇聯把砲彈打到中國來有什麼好處呢？」⁶⁷又如，1951 年底起蘇聯花布在華大量傾銷，許多地方採取強迫推銷的方式。山西汾陽青年團與友協動員團員、會員起帶頭作用，不分男女老少，每人至少要買一件蘇聯花布衣料，若有不穿花布衣服者，會被批評是「跟不上形勢發展」、「沒有國際主義精神」。然而穿著品味保守的中國人，一般認為花布只適合年輕女性。有些不願意穿花布的男性，推銷員立即冠以「思想落後」的帽子。也有一些老年人穿了花

⁶⁴ 〈天津市上層份子對中蘇會談的反映〉、〈西安市各階層對中蘇會談公報發表後的反映〉，《內部參考》，號 206（1952 年 9 月 8 日），頁 347-349。

⁶⁵ 〈旅大部分幹部、群眾對蘇聯有錯誤認識〉，同上書，號 247（1952 年 11 月 1 日），頁 11-12；〈旅大市甘井子區蘇軍飛機場負責同志對中蘇關係的意見〉、〈旅大市某些職員對蘇聯人員有歧視行為〉，同上書，號 252（1952 年 11 月 10 日），頁 118-121。

⁶⁶ 〈上海各界人民對中蘇會談公報的反映〉，同上書，號 225（1952 年 9 月 30 日），頁 455-457。

⁶⁷ 〈上海市「中蘇友好月」活動陷於僵局〉，同上書，號 261（1952 年 11 月 24 日），頁 294。

布衣服上街，卻遭人訕笑，甚至被看成是瘋子。⁶⁸因此人民普遍抱怨強銷政策，進而釀成對蘇不滿的情緒。

2. 許多知識分子與工商界分子的親美思想尚未完全消除。在中共建國初期，這些人的反蘇與親美經常被連在一起。1949年秋天，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曾告訴蘇聯駐華大使羅申(Н. И. Рошин)說，中共從國民黨接收下來的工程師與專家，一共只有兩萬人；其中大多數都是政治觀念反動、親美的。⁶⁹在共產黨眼中，這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大多是留學歐美，或是價值觀受歐美影響的「舊社會餘孽」。許多曾在美國生活過的人，覺得美國人熱情，科學發達，民主自由，學制教材均優，物資豐富，汽車洋房、原子彈應有盡有。⁷⁰那些沒有出過國門的人，或透過書籍報章、美國電影，或由自身對中國近代史的詮釋，認定美國在歷史上向來對中國友好，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不像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那樣，老想瓜分中國。美國是不事侵略的「道義之邦」。部份工商界人士甚至認為美國是中國二次大戰時期的盟友，對中國有不少幫助，不像日本那樣殘暴。⁷¹還有人崇拜美國的物質文明；信奉基督教者，對美國更有好感。⁷²許多大學教授認為「政治蘇聯好，技術歐美妙」。⁷³技術人員親美輕蘇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

⁶⁸ 〈蘇南、浙江、山西榆次專區等地，在宣傳推銷蘇聯花布中的偏向〉，《內部參考》，號 214（1952 年 9 月 17 日），頁 280-281。

⁶⁹ 1949 年 10 月 28 日羅申與陳雲談話備忘錄，АВПФ（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ф. 100, оп. 42, пор. 19, пап. 288, л. 60.

⁷⁰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中北京市大中學校師生思想問題尚多〉，《內部參考》，號 266（1950 年 11 月 9 日），頁 29；〈保定、唐山、石家莊、秦皇島等四市群眾在抗美援朝運動中尚存在不少思想問題〉，號 299（1950 年 12 月 21 日），頁 114；〈天津高等學校教師思想改造學習限於停頓狀態〉，號 233（1951 年 12 月 18 日），頁 80。

⁷¹ 〈抗美援朝高潮中浙江某些群眾的思想情況和謠言〉，同上書，號 270（1950 年 11 月 14 日），頁 50。

⁷² 〈成都各階層對時局的反映〉，同上書，號 284（1950 年 12 月 4 日），頁 21-22。

⁷³ 〈重慶醫務人員對學習蘇聯先進經驗極不認真〉，同上書，號 37（1953 年 2 月 18 日），頁 245-246。

3. 歷史積怨或民族主義情緒造成的疑蘇、反蘇心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連串的挫敗，造成許多中國人對於外國人的疑慮猜忌，甚至一味排斥。有些工人便認為：「外國鬼都靠不住，蘇聯與美國差不多」。許多廣州與南京市民也都以為，中國地大物博，沒有蘇聯幫助也可以建設新中國。富強必須靠自己，別人都是靠不住的。⁷⁴清末中國領土被俄國侵佔最多，東北人更是難忘這一點，常常問：「蘇聯強佔我們江東六十四屯和貝加爾湖，為什麼不還給我們？」⁷⁵有些北京市民懷疑蘇聯對中國「無私」的援助，是居心不良，絕對另有打算。也有工人說，別只看報上說蘇聯派專家到中國來，說不定哪一天中國得送多少糧食到蘇聯去？並質問道：又看不見所謂蘇聯先進經驗，怎麼知道是真的？⁷⁶如果真的是無私的援助，那麼為什麼不多給中國一些機器，多開幾個大工廠？為什麼蘇聯工程師在華工作還要拿高薪？⁷⁷
4. 反對一邊倒政策與萬事吹捧蘇聯。許多民衆對於一邊倒倒得太厲害，並將蘇聯人及其社會捧上天的作法，十分不以為然。反對向蘇聯一邊倒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流傳在天津高等學校教師之間的一句話：「毛主席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可惜剛站起來又倒下去了。」⁷⁸昆明工人認為「中國應該中立和自立更生，不應該一邊倒，也不應

⁷⁴ 〈廣州市民和工人群眾對蘇聯認識模糊〉，《內部參考》，號 255（1952 年 11 月 15 日），頁 180-181；〈南京市中蘇友好月宣傳初步經驗〉，號 265（1952 年 12 月 1 日），頁 17。

⁷⁵ 〈東北工學院等高等學校部分教師的錯誤、反動言行〉，同上書，號 133（1952 年 6 月 14 日），頁 156-158；〈東北區中小學教育工作中存在著嚴重的問題〉，號 277（1952 年 12 月 18 日），頁 244-248。

⁷⁶ 〈北京市群眾對蘇聯援助中國有懷疑〉，同上書，號 256（1952 年 11 月 17 日），頁 198-200。

⁷⁷ 青年團上海市工委宣傳部整理，〈私營工廠、商店青工對「中蘇友好」思想問題的調查〉，上海市檔案館，1952 年 11 月 11 日，C21-2-319，頁 26。

⁷⁸ 〈天津高等學校教師思想改造學習限於停頓狀態〉，《內部參考》，號 233（1951 年 12 月 18 日），頁 80。

該要援助」。⁷⁹復旦大學的學生也譏諷地說道：「蔣介石親美還沒掛杜魯門像，共產黨親蘇，連史達林像也掛出來了」；「這也學蘇聯，那也學蘇聯，不如把中央教育部改爲莫斯科教育部」。再者，相應於官方宣傳蘇聯樣樣第一，老百姓也會說中國人口也是世界第一。⁸⁰許多人也不相信蘇聯是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否則爲何做出來的手錶又大又笨？⁸¹上海有一個學校的政治教師誇捧蘇聯農民生活富裕，並說：「蘇聯集體農莊的豬圈比我們中國人住的房子還要漂亮。」結果引起學生很大的反感。⁸²

5. 人民不瞭解中蘇官方政策之內情。1950年中蘇同盟條約公布後，百姓質疑爲何蘇聯不歸還中長路，不從旅順撤兵。事實上，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以事涉中蘇外交政策，還特別指示各報刊雜誌社與宣傳機關，不應專門答覆讀者爲何中長路與旅順要到1952年才移交中國的問題。⁸³又如，許多百姓特別不滿爲何蘇聯在韓戰時期不出兵，不捐獻飛機，不幫助中國？他們認爲這是蘇聯居心不良，光讓中國出兵，死的是中國人，而且只會將戰爭引到中國而已。⁸⁴他們當然不知道蘇聯爲了不升高美蘇在朝鮮半島的對抗衝突，雖然暗中派出空軍

⁷⁹ 〈昆明市各階層人民對中蘇友好的錯誤認識〉，《內部參考》，號261（1952年11月24日），頁297。

⁸⁰ 〈上海、重慶等地群眾對「中蘇友好月」的認識模糊〉，同上書，號259（1952年11月21日），頁257-258。

⁸¹ 〈北京市群眾對蘇聯援助中國有懷疑〉，同上書，號256（1952年11月17日），頁198-200。

⁸² 1952年12月23日，青年團上海市工委，〈青年團上海市工委「中蘇友好月」工作總結〉，上海市檔案館，C21-2-244，頁73。

⁸³ 〈中央宣傳部關於宣傳中蘇新約幾個問題的指示（1950年3月11日）〉，頁22-23。

⁸⁴ 〈天津各界對目前時局的反映〉，《內部參考》，號273（1950年11月18日），頁78-82；〈津市電業工會等部份職工對目前時局的反映〉，號277（1950年11月24日），頁111-113；〈上海大中學校學生仇美觀念尚未完全樹立〉，號280（1950年11月28日），頁145-147；〈在捐獻運動中北京各大學學生的思想情況〉，號104（1951年6月21日），頁71-72；〈南京各階層在捐獻中的思想情況及問題〉，號113（1951年7月2日），頁4-5。

支援中共軍隊作戰，卻始終沒有對外公開。⁸⁵到了 1952 年蘇聯延長旅順港的使用期限，有些小學生教師甚至認為這是蘇聯的「軍事侵略」。⁸⁶其實，這是因為當時中共考慮到韓戰未了與臺海戰略關係，決定暫緩讓蘇軍退出旅順，直到中日和蘇日締結和約時為止。不過，中共也沒有對老百姓說明這項決策。

總之，在中共建國初期，對蘇聯不滿者以知識分子與城市居民為多。他們由於歷史與現勢因素所產生的疑蘇、反蘇情緒，並非短時間內能完全消除。但是他們在全中國的人口比例中佔絕對少數。事實上，自 1949 年以來，中共密集動員組織宣傳蘇聯，其成效仍是相當顯著。最好的例子就是人民對史達林逝世的反應。1953 年 3 月初，史達林逝世的消息傳到中國。雖然有少數人對史達林的死幸災樂禍，在飯館大吃大喝表示慶祝，⁸⁷大多數中國民眾則深感哀痛，彷彿天塌下來一般。有人因此哭暈過去，或悲傷到影響工作，或無法進食、入眠。甚至連一些大知識分子，如南京大學副校長孫叔平也當眾大哭失聲，悲痛不已。⁸⁸更有人擔心史達林的死會影響蘇聯對中國的友好關係與建設，或降低對中國的援助，進而使得中國無法順利到達社會主義社會。⁸⁹

1953 年也正是中共在城市熱烈推展第一個五年計畫的開始，在農村則是企圖加速農業合作化，鼓勵更多農民報名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自然而然

⁸⁵ 詳見沈志華，〈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蘇聯空軍〉，《中共黨史研究》，期 2（2000 年），頁 69-74。

⁸⁶ 〈上海、重慶等地群眾對「中蘇友好月」的認識模糊〉，《內部參考》，號 259（1952 年 11 月 21 日），頁 258。

⁸⁷ 〈天津部分資本人對斯大林的死幸災樂禍〉，同上書，號 54（1953 年 3 月 10 日），頁 262-263。

⁸⁸ 王覺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年），頁 283-284。

⁸⁹ 〈我國各地人民對斯大林同志逝世的反應〉，《內部參考》，號 53（1953 年 3 月 9 日），頁 202-207；〈北京青年對斯大林同志逝世的反應〉，號 54（1953 年 3 月 10 日），頁 259；〈天津部分幹部對斯大林逝世在群眾中引起的混亂情況表現束手無策〉、〈天津工程技術人員對斯大林逝世的反應〉，號 56（1953 年 3 月 12 日），頁 296-297、300；〈斯大林同志逝世後天津部分工人學生過度哀痛〉，號 57（1953 年 3 月 13 日），頁 343-344。

地，蘇聯集體農莊幸福的生活，漂亮整齊的房屋，衣著嶄新美麗的農民，一袋煙工夫就能種完一大片土地的拖拉機，透過展覽圖片、幻燈片、電影一一呈現在中國農民眼前。廣大農民開始盼望社會主義的絢麗遠景：「電燈電話、樓上樓下、麵包牛奶」，也開始想像「好日子來臨」之後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因而產生各式各樣他們想進一步理解的問題。很多農民（尤其是不識字的農民和勞動婦女）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蘇聯都用機器生產了，人幹什麼？」一般農民都不知道吃牛奶的好處，一個鄉主席居然解釋說：「吃牛奶省糧食。」很多農民要求知道：蘇聯人民一年四季每天每頓只吃麵包牛奶嗎？蘇聯農民一年四季的生產和生活情況到底怎樣？農忙時怎樣？農閒時又怎樣？也有人問：「既然『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為什麼過了這麼多年，我們還沒到『明天』？」但也有聰明的農民質疑：「蘇聯各地人民生活都是那麼好嗎？是否只是宣傳好的？」⁹⁰由他們的反應可知，即使到了 1950 年代中期，中國農民對於蘇聯的情況多半還是一知半解，依然談不上親蘇或反蘇。

知識分子與城市居民則不然。在 1950 年代中蘇關係史上，扭轉他們對蘇成見最大的突破，莫過於赫魯雪夫第一次來華訪問所帶來的厚禮，亦即 1954 年 10 月 12 日發表的中蘇會談公報。其主要內容包括蘇聯給予中國長期的鉅額貸款；簽訂科技合作協定，派遣大量專家到中國；自旅順軍港撤軍；原中蘇合營的石油和航空公司的蘇聯股份全部移交中國。這些消息一經公開，聞者莫不歡欣鼓舞。《內部參考》所收錄的一些事例便頗能反映出民間這種真實的雀躍之情。當北京市民聽到旅順歸還中國的消息，都很興奮，紛紛感謝蘇聯，表示這回終於看到了實實在在的友誼。許多人也進而檢討自己過去對中蘇友誼不正確的認識。一個電業局的技術人員說：「我過去認為蘇聯侵犯中國主權，這種看法在中長鐵路交還時已解決了，這次公報又進一步地把我不正確的思想徹底地批判了。」任職自來水公司的某職員說：「我原

⁹⁰ 曾毓秋，〈山村的一個俱樂部〉，《人民日報》，1953 年 6 月 15 日，版 6；中蘇友好報讀者來件組編，〈中蘇友好報內部參考資料〉，上海市檔案館，1954 年 12 月 20 日，C38-2-50，頁 17-18。

來以為中蘇合辦石油公司是蘇聯佔便宜，這回我對蘇聯完全放心了。」農林局一個工程師說：「旅順口交給中國，打破了我對蘇聯的顧慮，今後一定要更好地去學習蘇聯。」許多大學教授也都很興奮，認為蘇聯真是「大公無私」、「無微不至」的幫助中國。北大有位教授說：「現在再不相信蘇聯就是頑固了。」農業大學一位講師說：「過去對蘇聯不感到怎樣，現在感到親切了。」教授們對科技合作協定反應更是熱烈。清華大學的教授說：「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名義上是平等互利，實際上是蘇聯單方面幫助我們。」不少資本家也都承認過去對蘇聯有許多誤解，是自己想錯了。⁹¹自然，即使多數人覺得蘇聯好，還是會有一些人懷疑蘇聯這樣慷慨的幫助中國可能別有用心。有人認為：「周（恩來）外長向聯合國控訴美國侵略臺灣，但怕蔣介石可能控訴蘇聯侵略旅順，因此蘇聯才將旅順口交回。」⁹²不過，與前述的正面反應相較，這樣的負面看法畢竟只佔少數。

事實上，新的親蘇價值觀在 1950 年代中期已經逐漸形成；有的人因為信服蘇聯專家對中國援助的專業與熱忱，⁹³有的人因為觀察政治局勢而向親蘇態度靠攏。例如，若干廣州學生認為在工礦界，「跟蘇聯專家進步快，三年可成工程師。」⁹⁴因此令許多教授感嘆蘇聯專家一言九鼎，而他們的話沒有人要聽，不得不怨恨「自己鼻子不高，眼睛不藍，頭髮不黃」。⁹⁵在武漢則有人視聆聽蘇聯專家講學為特權，是被列入政治可靠的一類，否則即代表自己在政治上有問題。⁹⁶

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壟斷媒體與其他資訊傳播管道，1950 年代絕大多

⁹¹ 〈北京市各界人民對中蘇會談公報的反應〉，《內部參考》，號 234（1954 年 10 月 15 日），頁 191-192；〈北京市各界人士對中蘇會談公報的反應〉、〈廣州市工商界人士對中蘇會談公報的反應〉，號 248（1954 年 11 月 1 日），頁 11-16。

⁹² 〈北京市各界人士對中蘇會談公報的反應〉，同上書，號 248（1954 年 11 月 1 日），頁 13。

⁹³ 詳見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頁 236-239。

⁹⁴ 〈廣州市高等學校畢業生政治思想情況相當複雜〉，《內部參考》，號 192（1954 年 8 月 26 日），頁 394。

⁹⁵ 〈華東民主人士對統戰工作的意見〉，同上書，號 21（1955 年 1 月 30 日），頁 374。

⁹⁶ 〈武漢地區高級知識分子的情況〉，同上書，號 2（1956 年 1 月 10 日），頁 28。

數的中國人無法查證當時國外發展的真實情況。除了少數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之外，照單全收官方宣傳的人恐怕佔多數。當時只有極少數有機會出國的人，可以檢驗官方宣傳的真實性。雖然中國官方代表訪蘇團，所到之處都經過特別的安排，但在有意無意之間，總會看出一些有別於當局刻意營造的印象。例如，1956年4月友協組織的訪蘇代表團，副團長千家駒回國之後，曾在《人民日報》撰文，盛讚蘇聯開墾荒地的精神與成就。⁹⁷事實上，當他參觀莫斯科大学時，外面正是傾盆大雨，大學的主樓雖有二十多層之高，當時在最底層活動的代表團，竟能看到大雨從樓層中直沖而下。蘇聯建築內部構造之粗製濫造可見一斑。身為訪蘇代表的千家駒，當然不可能將這樣的負面印象發表在《人民日報》。⁹⁸又如，曾在《中蘇友好報》擔任總編室主任的歐陽惠回憶說，他到列寧格勒的一個集體農莊參觀，行程中也安排參觀一位勞動英雄的家。他看到屋裡放了一架鋼琴，便一再請求主人表演，主人卻始終拒絕。他後來才發現鋼琴的標籤尚未撕去，這一家事實上沒人會彈琴，擺的鋼琴只是作作樣子而已。這個經驗使歐陽惠開始對蘇聯的種種產生懷疑。⁹⁹

留蘇學生中也出現過類似經驗。中共黨員彭瑞桑被派到莫斯科地質學院讀書。1956年暑假他到北哈薩克斯坦工作一個半月，幫助農場收割。他發現在當地的所見所聞與國內宣傳蘇聯的內容大相逕庭。他覺得一般蘇聯人都沒有什麼共產主義人生觀，他們的工作都只爲了錢。蘇聯學生平常也不用功，只有在考試期間，才臨時抱佛腳。考試作弊的現象更是普遍，誰不偷看反而奇怪。他們常說：「多休息休息吧，我們夠吃夠穿，何必忙呢？」並且，同學之間也很少看到同志的友愛，除了要好朋友能彼此關照外，很少有人肯犧牲一點個人利益來爲大家服務。「總之我感覺在蘇聯是邪氣壓著正氣。」

⁹⁷ 千家駒，〈向正在建設共產主義的蘇聯人民學習〉，《人民日報》，1956年11月2日，版6。

⁹⁸ 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香港：香港鏡報文化企業公司，1986年），頁230。

⁹⁹ 2002年10月26日，筆者在北京的口述訪問。

彭瑞桑也因此批評國內宣傳蘇聯不實，必須改進。¹⁰⁰由此可見，對於絕大多數從未踏上蘇聯國土的中國老百姓，國內宣傳還是頗能發生作用。

這裡必須一提的是，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的「秘密報告」，在官方報導之中均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不可能成為宣傳蘇聯的重點。事實上，它在知識分子之中流傳甚廣。因為從莫斯科帶回來的「秘密報告」譯文印成小冊後，封面上沒有標題，只印有「內部材料，注意保存」，隨著《參考資料》發放。《參考資料》雖然理論上只發到高級幹部，卻非機密刊物，有心人士，不難取得。再者，當時外文書店出售美國共產黨的《工人日報》，上面也有英譯本全文，北京各大學學生競相購買，頓時銷售一空。¹⁰¹這份報告對知識分子的衝擊極大，它破除了以往關於蘇聯的神話，幾乎將七年來中共的親蘇宣傳一筆勾消。許多知識分子認為既然蘇聯模式出了問題，中國也必須改弦更張，另謀出路。他們也開始思考如何防止重蹈蘇共與史達林的覆轍，以及共產主義理論及其本質的問題。新華社記者戴煌回憶他和同事在報社聽完這個報告後，大家頓時覺得彷彿在自己固有的精神領域中，被「投下了一顆無聲無息的原子彈」，「人人震驚、愕然、迷惘，伴之以輕輕的長嘆。」戴煌想起自己在 1953 年聽到史達林過世的消息，他和大家一樣難過得痛哭流涕，哀愁萬分，擔心找不到第二個史達林領導全人類繼續奮鬥。這份報告讓他意識到，原來史達林並不像中共過去宣傳與想像的那麼偉大。¹⁰²蘇共二十大對毛澤東、中共本身、知識分子的衝擊與影響至深且廣，由於涉及之層面極大，絕對需要更大篇幅處理，在此無法做比較全面與細緻的闡析。

也因為蘇共二十大的除魅作用，在 1957 年春天曇花一現的鳴放運動中，知識分子對蘇不滿的觀點又浮上檯面。例如，龍雲（民革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人大常委）重新提出蘇聯從東北運走機器的問題，並且認為抗美援朝戰爭的經費，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中國借蘇聯的債要還，不如

¹⁰⁰ 〈我國留蘇學生彭瑞桑寫信給人民日報表示他對蘇聯的個別缺點很為不滿〉，《內部參考》，總號 2028（1956 年 10 月 22 日），頁 1058-1071。

¹⁰¹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頁 349。

¹⁰²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北京：中央編譯局，1998 年），頁 2-5。

美國慷慨大方」。¹⁰³許多高等院校領導與教授則批評 1952 年的院系調整是「亂點鴛鴦譜」，急於求成的硬搬蘇聯教學制度，不考慮中國國情，反而變成冒進，遺害甚大。¹⁰⁴又如居住在中蘇邊境的學生，久久無法忘懷領土問題（蘇聯不應繼續霸佔清末中國被迫割讓的海參崴、庫頁島、江東六十四屯），以及蘇軍接收東北時的惡行，更質疑蘇聯對中國友好的程度（蘇聯貸款要利息、爲什麼不出兵幫助中共解放臺灣）。¹⁰⁵但是在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大鳴大放之後，毛澤東緊接著展開反右派鬥爭，嚴懲那些膽敢向黨的政策與權威挑戰的人。許多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其罪狀之一就是他們曾經發表不滿蘇聯的言論。在當時反蘇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

1958 年，在向黨交心的政治立場表態運動中，過去最崇拜歐美民主制度與科技的所謂民主人士與科學界人士，紛紛批判自己崇美輕蘇的思想，並且表示要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和科學技術。¹⁰⁶許多工商界人士也表示，他們看到了蘇聯人造衛星升空的成就，才承認蘇聯科學比美國先進，決定學習蘇聯，跟著共產黨走。¹⁰⁷這些人之中有許多曾經親身目睹歐美社會的進步繁榮，無論是因爲屈服於政治壓力或真心佩服蘇聯科技，他們向黨交心表態要學習蘇聯，等於是將中國最「頑固」的一批親美反蘇分子，也被公開納入親蘇的旗幟之下了。從中共建國前後開始，利用宣傳與政治手段，雙管齊下，宣傳學習蘇聯，進而達到全國親蘇的目的，到了 1958 年至少在表面上可謂大功告成。

¹⁰³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9 日，版 5；1957 年 6 月 20 日，版 3。

¹⁰⁴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2 日，版 3；1957 年 7 月 11 日，版 12；1957 年 9 月 22 日，版 3。

¹⁰⁵ 〈省中蘇友協關於學生鳴放中對蘇不友好的言論給省委宣傳部的報告〉，1958 年 1 月 23 日，黑龍江省檔案館，全宗 134，目錄 2，卷宗 32，頁 3-7。

¹⁰⁶ 《光明日報》，1958 年 2 月 2 日，版 1；九三學社的社會主義競賽決心書中，有一條「誠心誠意學習蘇聯先進科學技術」，1958 年 3 月 2 日，版 1；1958 年 3 月 4 日，版 3；1958 年 3 月 17 日，版 1。民主黨派與無黨派民主人士通過的「社會主義自我改造公約」，其中一條是「努力學習馬克斯列寧主義，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和科學技術」，1958 年 4 月 13 日，版 3；1958 年 4 月 16 日，版 3；1958 年 5 月 4 日，版 2。

¹⁰⁷ 《光明日報》，1958 年 4 月 23 日，版 1；1958 年 4 月 25 日，版 3。

諷刺的是，就在中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使老百姓產生親蘇思想的同時，中蘇上層關係卻往反方向發展。當中蘇上層開始出現分歧與矛盾時，只有中央領導人知道，普通幹部和民衆毫不知情。所以，正當毛澤東為聯合艦隊與長波電臺問題對蘇聯大使尤金(П. Ф. Юдин)和赫魯雪夫大發雷霆之際，老百姓反而為蘇聯領導人訪華歡呼雀躍，認為蘇聯已經擺脫了大國主義的傲慢，尊重中國，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因而大為提高。¹⁰⁸到了1959年秋天，赫魯雪夫訪美之後第三度來華，又與毛澤東為中印邊界衝突問題，鬧得不歡而散。此時，在中共高級幹部之間已經廣為流傳中蘇不和的消息，但基層對此依然一無所知。直至1960年夏天，蘇聯突然決定全面撤回在華專家，這時一般幹部與百姓也知道中蘇關係破裂。雖然居住在中蘇邊境城市的百姓，仍有比較頻繁的節日聯歡或書信往來等活動，但是隨著中蘇關係的緊繃，官方也不鼓勵筆友通信往來，認為此舉可能有洩露黨國機密之嫌，必須密切注意。¹⁰⁹其後文化大革命爆發，高舉反蘇修的大旗，人民即使對蘇聯仍有好感，迫於當時政治情勢，更盡量避免與蘇聯有任何瓜葛聯繫，遑論公開表達親蘇情緒了。

四、結論

從1949年建國開始，中共傾全力宣傳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中蘇友好協會成立的主要任務，就是專門宣傳學習蘇聯，負責動員與組織群眾，透過琳琅滿目的宣傳活動，改變人民對蘇聯無知或不滿的情緒；同時頌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勾勒出以蘇聯社會為範本的幸福快樂生活；強調中蘇友好，兩國共同攜手對抗具有侵略野心、發動戰爭的資本主義陣營，進而達到親蘇反

¹⁰⁸ 關於艦隊與電臺引起的誤解與衝突，詳見沈志華，〈赫魯曉夫、毛澤東與中蘇未實現的軍事合作〉，《中共黨史研究》，期5（2002年），頁32-43；〈廣州市各界人士對中蘇會談公報的反應〉，《內部參考》，總號2548（1958年8月5日），頁3；〈上海、太原等市各階層人民對中蘇會談公報的反應〉，總號2549（1958年8月6日），頁3。

¹⁰⁹ 〈共青團長春市委員會關於蘇聯青少年來信徵求筆友問題和處理意見的請示〉，長春市檔案館，1961年7月4日，全宗1，目錄1-14，卷宗34，頁82-84。

美的目的。經由中蘇友好協會在中共建國初期的宣傳與動員，至少使得大多數老百姓知道中國未來要走蘇聯的道路。但是在知識分子與城市居民之中，仍普遍存有疑蘇，甚至反蘇的情緒。1954年赫魯雪夫決定歸還旅順，增派專家來華，提高對華貸款等，這些具體實例均被作為宣傳內容，因此頗能博得人民對蘇聯的好感。再加上中共所使用的政治壓力與政治手段：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前，凡是有「反共、反蘇、反人民」的言論者，極易被視為異己分子；¹¹⁰反右運動之後，反蘇即可成為「右派」的罪名之一，使得全中國大陸的親蘇之勢在表面上已於1958年大致形成。但在此時，中蘇上層關係卻又發生了變化，逐漸走向分裂之途。不過，雙方均想維持中蘇友好的表面關係，不願獨自承擔破裂之責，所以宣傳蘇聯的活動，勉強持續進行。一直要到1960年夏天，蘇聯突然撤走專家，才正式公開了雙方關係的破裂。及至文化大革命開始，蘇聯成為中共頭號敵人。兄弟鬩牆之後的仇恨，與外人之仇相比，往往更深。中共宣傳工作也就由原來的親蘇走向了對立的反蘇。

中共的宣傳帶有明顯的強制灌輸單一思想的特色。當中共需要全面倒向蘇聯之初，許多知識分子與城市居民基於民族主義情緒或教育背景的關係，仍有很大的反蘇情緒，農民大眾則是對蘇聯一無所知；而當民間逐漸產生對蘇好感之後，中共領導人卻又開始考慮與蘇抗衡。因此，中共的宣傳既不能須臾放鬆，又往往與民眾情緒相對立。有一事例頗能說明這種官方宣傳與民間情緒錯位的現象。1957年「大鳴大放」時，一位北京的工程師對人說：「其實蘇聯專家中不一定都是好人。」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就因為這句話，這個工程師被打成右派，逐出北京，調到東北工作。到1965年，中蘇關係已經全面惡化，這個工程師又私下對人說：「其實蘇聯專家中也有不少好人。」又因為這句話，在文革時他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下放青海改造。¹¹¹由這例子可以說明對蘇關係，從上熱下冷到上冷下熱的錯位，所可能帶來的悲劇。

¹¹⁰ 從大同市公安部門收到各雜誌編輯部退回的原信來看，有說：「硬把蘇聯的生活制度搬給中國人民，誰要辯論，就扣上反革命份子帽子鎮壓。」〈山西省大同市發現壞份子寄往外地十三封反動信件〉，《內部參考》，號167（1955年7月20日），頁267。

¹¹¹ 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頁3-4。

雖然中共宣傳親蘇或反蘇會產生錯位現象，卻也說明中共的宣傳具有相當成效。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在這成效的背後，佔全國人口少數的知識分子，他們所發出異於官方觀點的「雜音」。從他們對宣傳蘇聯回應的多樣性，可以清楚地說明即使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人民也不是像極權主義理論者所言，只能被動地承受當權者的意識形態灌輸，淪為國家政策下的棋子，完全被原子化(atomized)，毫無自己的看法。由本文的敘述與分析可以得知，改變許多知識分子原有反蘇觀感的主因之一是，他們在 1950 年代中期看到了蘇聯對中國的實質友好，而不盡然是由於先前官方密集卻較為空泛的宣傳所致。職是之故，當知識分子獲悉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等問題之後，也等於打破了對蘇聯的神話。只是當時的言論空間又比中共建國初期狹小，他們更不敢在公開場合表達疑蘇或反蘇的情緒。到了 1957 年的反右運動之後，反蘇完全噤聲。換言之，中共對知識分子宣傳之有效性必須與政治手段配合。許多人只是因為畏懼政治罪名，而不是真的從此就完全跟著官方宣傳走。由本文之舉證可以看出極權理論者詮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侷限。

在民主自由社會中，輿論或人民的聲音，向來是學者研究的重點之一。但是在共產極權世界裡，這方面的研究至今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西方學界對於蘇聯社會性質的研究已有若干成果，唯獨對中國大陸，特別是對改革開放之前中共社會的研究，十分不足，筆者非常期待日後能有更多這方面的研究出現。

徵引書目

一、檔案

1. 上海市檔案館，C38-1-30、C38-2-80、C38-2-110、C21-2-244、C21-2-319。
2. 大連市檔案館，全宗 7，目錄 2，卷宗 60。
3. 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全宗 309，目錄 1，卷宗 125；目錄 2，卷宗 140。
4. 外交部檔案庫，亞西司，197.1/002，125.5/0001。
5. 吉林省檔案館，全宗 1，目錄 1-22，卷宗 45；全宗 77，目錄 8，卷宗 4。
6. 長春市檔案館，全宗 1，目錄 1-12，卷宗 49；目錄 1-14，卷宗 34。
7. 黑龍江省檔案館，全宗 134，目錄 2，卷宗 26、33。
8. АВПРФ（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ф. 100，ор. 42，пор. 19，пап. 288。
9. РГАСП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無檔號。

二、報刊雜誌

1. 《人民日報》，1949-1960 年。
2. 《內部參考》，1950-1958 年。
3. 《友誼》，1949 年。
4. 《北大週刊》，1949 年。
5. 《光明日報》，1958 年。
6. 上海市電影局史志辦公室編，《上海電影史料》，輯 5，1994 年。

三、專書

1. 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香港：香港鏡報文化企業公司，1986 年。
2. 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文獻選編，1949-1956》，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 年。
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哈爾濱文史資料》，出版地與出版者不詳，1986 年，輯 10。

4. 中國社科院、中央檔案館編，《1953-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綜合卷）》，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2000年。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7.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
8.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9. 牛軍，《從延安走向世界：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10. 王佩平、孫寶運主編，《蘇聯紅軍在旅大》，大連：大連市史志辦公室，1995年。
11. 王覺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
12.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13. 共青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中國青年運動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冊1。
14. 江蘇省中蘇友好協會編，《蘇聯專家在江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53年。
15. 竹內實編，《毛澤東集》，東京：蒼蒼社，1983年。
16. 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7. 吳冷西，《憶毛主席》，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
18. 李慎之、何家棟，《中國的道路》，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年。
19. 沈志華，《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2000年。
20. 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年。
21. 河南省中蘇友好協會編，《蘇聯專家在河南》，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
22. 張毓茂，《跋涉者——蕭軍》，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

23. 湖南省中蘇友好協會編，《蘇聯專家在湖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
24. 資中筠，《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5. 廖風德，《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
26.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北京：中央編譯局，1998年。
2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28. 薛銜天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45-194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
29. Aldrich, Richard J., Gary D. Rawnsley & Ming-Yeh T. Rawnsley ed.,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9-1965*, London: Frank Cass, 2000.
30. Gillin, Donald & Ramon Myers ed.,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31. Houn, Franklin W., *To Change a Nation: Propaganda and Indoctrin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NY: The Free Press, 1961.
32. Medvedev, Roy, *Khrushchev, the Years in Power*,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33. Rawnsley, Gary D. ed., *Cold-War Propaganda in the 1950s*, NY: St. Martin's Press, 1999.
34. Yu, Frederick T. C., *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 NY: Praeger, 1964.
35.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 (1949-1960 годы)* (蘇聯專家與中國軍工業的建立，1949-1960)，Петербург(聖彼得堡)：НИИХ，2000。

四、論文

1. 余敏玲，〈蘇聯英雄保爾·科察金到中國〉，《新史學》，卷 12 期 4，2001 年 12 月。
2. 吳淑鳳，〈走不出的第三條道路〉，《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
3. 沈志華，〈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蘇聯空軍〉，《中共黨史研究》，期 2，2000 年。
4. 沈志華，〈赫魯曉夫、毛澤東與中蘇未實現的軍事合作〉，《中共黨史研究》，期 5，2002 年。
5. 沈志華，〈關於 20 世紀 50 年代蘇聯援華貸款的歷史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期 3，2002 年。
6. 張仲實，〈認真加強關於蘇聯的宣傳工作〉，《學習》，卷 4 期 12，1951 年 10 月 1 日。
7. 陳學昭，〈赫魯曉夫集體農莊〉，《新中國婦女》，期 1，1954 年。
8. 章百家，〈從「一邊倒」到「全方位」——對 50 年來中國外交格局演進的思考〉，《中共黨史研究》，期 1，2000 年。
9. "Discussion," *Russian Review*, 45: 4, Oct. 1986.
10. Chang, Julian Po-Keng, "Propaganda and Perceptions: The Sell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65," Ph.D. Dis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1995.
11. Lu, Xing, "An Ideology/Cultur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Slogans in Communist China," *Discourse and Society*, 10: 4, Oct. 1999.
12. Yu, Xinlu, "The Role of Chinese Medi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5-1969," Ph.D. Diss., Ohio University, 2000.
13. Кейпл, Д.,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 1949-1960 гг" (揭開中蘇之間的神話, 1949-1960),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冷戰: 新角度與新文獻),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ИВИ РАН, 1995.

14.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蘇中科技合作，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No. 65: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五、口述訪問

1. 2002年10月26日，在北京訪問歐陽惠。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Chinese Communist Propaganda and Its Effects

Yu Miin-ling*

Abstract

Taking into accou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fter the end of Sino-Japanese wa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gradually formed the policy of leaning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However, before and after 1949, except for a small quantity of pro-Soviet intellectuals, many intellectuals were anti-Soviet due to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or to the troubled nature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past. A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the peasantry—they knew almost nothing about the Soviet Union. How to change popular mentality became an urgent task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In the fall of 1949 a key organization was founded specifically for the purpose of propagating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the Sino-Soviet Friendship Association (SSFA).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SSFA, the CCP hoped to inculcate favorable view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hinese populace.

A key feature of CCP propaganda was its attempt to impose a single unified ideology. While the CCP wanted all Chinese to embrace pro-Soviet sentiment, it had to battle against both ignorance and anti-Soviet sentiment.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Ironically, after the Chinese people eventually developed favorable views of the Soviet Union, top CCP leaders began to think of competing with the Soviet Union. Therefore, the CCP constantly had to intensify its propaganda on the one hand, while the party's propaganda ran against the actual views of the people on the other.

To be sure, the intellectuals' responses to the official pro-Soviet propaganda are relatively small in terms of percentage to the entire Chinese population. However, judging from the variety of their responses, it is clear that even in a communist society, people were not completely atomized and fully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arty-state, as the totalitarian model claims. In fact, people were not like chess pieces always passively moved by the party and lacking their own opinions. Examples cited in this article indicate the limits of the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 for interpret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Key words: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Sino-Soviet Friendship Association, Chinese Communist propaganda, Sino-Soviet relations